

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意义、困境及策略

吕红红

陇东学院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庆阳

【摘要】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有助于阐释中国学术话语权，破除西方学术话语中心主义，丰富世界译学理论体系，也能凸显本土翻译理论地位，实现中西学术思想的对话，向世界展示中国学术理论魅力。目前，有关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论文和专著国际发表占有量较小，本土翻译理论国外关注度和接受度不高，本土理论“走出去”传播不理想，究其原因：集中表现为我国学者缺乏国际传播意识，国际学术活动参与度低，与国外学者交流沟通少，理论传播受限于英文书写能力，传播手段欠佳等方面。鉴于此，为积极推动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提升中国学术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加强与国外学者有效沟通，本文提出从增强我国学者的国际传播意识，加强理论改写，提高英语书写水平，探索多维度中西学术对话方式四个方面来实现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国际化之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学术中的中国理论和其背后的哲学文化思想。

【关键词】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学术话语权；传播策略

【基金项目】2021 年陇东学院青年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翻译传播学视阈下陇东红色文化外译策略研究”(XYSK2101)

【收稿日期】2024 年 11 月 12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12 月 26 日 **【DOI】**10.12208/j.ije.20240099

Chinese native translation theory “Going abroad”: significance, dilemma and strategies

Honghong Lv

Colleg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Culture, Long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Gansu

【Abstract】As a part of Chinese academic system, Chinese native translation theory has undoubtedly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going abroad” which can not only establish Chinese academic power of discourse internationally, break the centralism of Western academic discourse, but also show the charm of Chinese academic theories to the world. Chinese native translation theory “going abroad” is a reflection of self-value, but also realizes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c thoughts to enric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proportion of international papers and monographs on Chinese native translation theories published on the whole is relatively small, the acceptanc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broad is not high,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native translation theories is unsatisfactory. The reason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ack of Chinese scholars’ ow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eness, limited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and poor means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view of this,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ese native translation theory to “go abroad” and enhance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academics,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realiz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native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four aspects: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eness of Chinese scholars,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rewriting, improving English writing skills, and diversifying overseas communication methods.

【Keywords】Chinese Native Translation Theory “Going Abroad”; Academic Power of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新世纪，中国翻译理论迎来了本土化发展的高潮，出现一批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中国特色翻译实

践本土翻译理论,但依旧面临着理论“走出去”的困境。谢天振(2014)^[1]从文化强势弱势文化译介行为,从译入译出的区别,来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及实质。李伟容(2015)^[2]从文化传播和译介规律入手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部路径。刘泽权、孙媛(2023)^[3]从理论能见度和理论参引量指数两个指标来探讨中国翻译理论“失语症”,提出“坚持本位—重读传统—构建话语—加大传播”的逻辑顺序和步骤,呼吁“话语权”建设,引领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解决中国翻译理论失语现状。也有学者从理论改写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翻译理论的传播,推动翻译理论经典化(韩子满,2022)^[4]。总体而言,我国研究者对立足国情的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的关照不足,针对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的文章体量较少。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在海外传播迫在眉睫。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有效传播途径推动中国翻译理论“走出去”,扩大其海外影响力,丰富世界译学理论体系。鉴于此,本文首先探讨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的价值,进一步分析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的现状及影响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的困境,最后指出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的解决办法。

1 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价值体现

1.1 丰富世界译学理论体系,促进世界文化繁荣

三十多年,我国学者不断突破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范式,提出一系列具有中国本土意识、源于中国文化和翻译实践的跨学科翻译理论。具体包括谢天振的译介学、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翻译学理论、胡开宝的语料库批评翻译学、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以及张佩瑶的推手理论、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和吴志杰的和合翻译学等,力图不断的突破西方翻译理论话语中心。整体上来说,西方翻译理论遵从科学化的研究范式,借鉴符号学,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等其他学科范畴和研究方法,注重“语法逻辑”和形式逻辑分析,探讨翻译理论,但缺乏对翻译学科的人文关怀,而就译学而言,仍然应当恪守人文属性,这是无可置疑(刘宓庆,2002)^[5]。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突破学科化界限,观照中国翻译实践问题,探索形成本土翻译理论的路径,彰显翻译研究的价值论意识,形成基于哲学,美学,社会科学于一体的科学的翻译理论,反映我国学者对本土翻译实践的理论提炼能力,折射出中国传统译学思想的文化基因。其根本目的是追寻翻译之真、探讨翻译之道,追求翻译之善、弘扬翻译之美,体现出具有整体论思想的翻译文化价值观。“合和”“大同”是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的一种折射,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中华民族

的崇尚人类大同的一种思想体现。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和合翻译学就是基于“和合学”的理念形成的翻译理论,不仅是翻译理论的一种实践,是中国温和向善的大国风貌的观照,更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根基的国际化展现。“共生翻译”更是集诸多人文学科领域于一体相,学科间进行交叉与渗透,探讨翻译本质和翻译价值,为译学研究维度和学科整合带来新的思考。中国本土翻译理论根植于中国传统人文思想,追求真善美的翻译价值观,将人文精神与翻译价值结合起来,打造出具有时代价值观念的本土翻译理论理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既向国际展示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成果,也展现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背后所蕴含的中国人文思想,促进世界文化交流。

21世纪西方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论文集《翻译、历史和文化》中提出了“文化转向”,后又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翻译成为研究人类文化的一个切入口,这也不断印证翻译与文化的关联。纵观人类历史,不同的文明互鉴构成人类发展的历史,翻译在人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明末清初的“强国”科技翻译,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翻译,都在促成不同思想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源自于翻译实践的翻译理论必然能够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活动,影响着人类思想和文化交流。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为我们打开一扇窗,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势必也会促进译学思想交流,展现出思想理论的多样性,丰富世界译学理论体系。翻译理论的发展不仅需要根植于西方哲理思辨思想的西方翻译理论,同样源于中国人文观照的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也能促进文化交流,实现文明互鉴。两者互为补充,共同丰富世界学术文化。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类伟大的进步体现在交流和融通之中,会通有无才是我们的长久之计。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90年在其80寿辰的聚会上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不同文明的相处原则。

1.2 增进中西翻译理论交流,实现学术对话

福柯认为“话语”是剖析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要素。主体性是话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话语建构、社会主体的身份、地位、意识形态等组成、并受话语支配。陈述主体必须依托话语体系而存在,其角色和属性由话语定义(Foucault,1981^[6]),可见话语具有强大的力量,凸显其功能和地位。不同领域的话语总有各自不同阐释话语主题的概念,方式,意图,传递不同的话语思想

和情感。话语权及其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当今各国加强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对外发展进程中构建国家形象、加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策略（胡宗山，2014）^[7]。学术话语权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就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最有力的证明。

20世纪英国哲学家布朗依“学术共同体”这一概念，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目标，并且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而构成的一个群体。我国学者和国际学者都属于翻译研究群体，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翻译现象，探寻翻译本质，其最终价值追求和目标一致。中国本土翻译理论是中国译学体系中的一系列概念、术语、范畴、规律等衍生出来的系统化表述，体现我们翻译思想话语的逻辑性、连贯性和完整性，折射出我国学者的学术能力水平，展现我国学者的翻译理论思想深度，传达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思想。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对外传播其本质是文明互鉴下实现知识共享，实现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学术思想交流，共同解决现实问题，成就“翻译理论共同体”。中西“学术共同体”的交流才能丰富多元学术话语体系，创造价值。我国唐代贾公彦在其所撰《周礼义疏》里对翻译所下的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从这句话可以更好的理解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的最终目的其本质是“相解”与“相用”。

2 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现状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是国际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学术舞台的表现也体现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学界影响。我们了解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在国外的的发展情况，势必从国际知名翻译类刊物及知名出版社发表的论著数量上可以给我们以客观呈现。本文援引韩子满、钱虹在中国翻译2021年的实证研究文章数据，通过对国际学术14种国际译学期刊的发文情况来考察中国翻译理论的国际传播现状，中国学者在国际著名期刊的发文总量截止2020年是557篇，占比9.56%，量上并不是很乐观。主题上，更多关注的是翻译实践类，口译类的文章比较多，有关翻译理论的文章很少，但是从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国外被引频次上来看，胡庚生的生态翻译学和胡开宝的语料库翻译学被引频次显著高于其他，整体呈现出我国本土翻译理论除生态翻译学和语料库翻译学在国际期刊上有一定影响力外，其他本土翻译理论国外接受度不高。

目前国际上有不少专著专门推介中国本土翻译理

论，如谢天振教授在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和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上推出了译介学。Robinson (2013)^[8]有专门撰文介绍胡庚申教授的生态翻译学。胡开宝教授与 Routledge 合作主编“应用语言学研究前沿” (*Frontier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系列丛书、与 Springer 合作主编“语料库与跨文化研究” (*Corpora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系列丛书等。国际期刊 *Perspectives* 主编 Valdeón 教授2017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现状和展望》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21st Century: Current Trends and Emerging Perspectives*) 对在 *Perspectives* 期刊2012-2017发表的有关中国翻译研究的文章的收录，都能充分肯定中国翻译研究蓬勃发展的现状，也表明西方对中国翻译研究的浓厚兴趣，

近年来，陈德鸿(2004)选译《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理论》、张佩瑶(2006)编译《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等相关中国译论读本都已在国际上陆续发表。国际译学名刊 *Translation Studies*、*Meta*、*Perspectives* 等亦通过组织国内外学者聚焦中国译论与国际翻译研究，鼓励中国学人立足中国丰富的传统译论，建构中国独特的翻译话语体系，以平衡东西方学术交流状态。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始接纳和认可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展现出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兴趣和关注，我国学者也已经具备主动传播本土翻译理论的学术意识，但整体上来说，我国本土翻译理论国际影响力不够明显，传播效果欠佳，国际同行关注太少。为此，国内译学界也应该深思。韩子满、钱虹(2021,103)^[9]认为学界应该强化中国翻译理论的国际传播意识，主动积极推介当代中国翻译理论，提升中国翻译理论的国际认知度，助力建构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在国际知名翻译类刊物及知名出版社发表的论著发表并未达到我们预期，但我们相信，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在“走出去”已迈出来重要的一步，这也无疑也是中外译学对外话语交流的最好证明。

3 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2016)^[10]，以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对话需建立在双方势均力敌的前提下，我们目前在对外话语体系中处于弱势，参与度小，这势必造成话语主体双方的不平等，以及话语错位。中国本土翻译理论没

有“走出去”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们在与西方进行译学“对话”中的话语缺席。缺席意味着失语，反思话语体系中我们存在的问题，有益与我们自身的发展。

3.1 缺乏国际化传播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接轨成为我国经济，文化，学术，思想交流很重要的一步。源自中国，面向世界，惠及全人类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站在全球视角来去看交流合作，这也为我们学术交流指明了发展方向。学术的国际化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大步进入国际学术领域。中国学术国际化不仅肩负知识共享和交流的使命，更契合了国家重大文化战略，彰显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以及影响力的诉求，体现这我国学者期待交流的学术意识，部分学科已经很好的“走出去”，实现学科国际化。反观翻译学科，一方面基于西方话语霸权和中心主义的影响，学术话语发声受限，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翻译研究学者自身为推动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意愿相对薄弱，对当下学术国际化的认识不到位，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传播不理想。

3.2 翻译学科的偏人文属性限制其传播路径

翻译学科的发展总是围绕着其学科性质在不断变化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家们主要从翻译的语义对等来去讨论翻译，认为翻译一种语言转换行为，翻译理论基本上是围绕语义等值来去讨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功能主义的兴起，翻译研究已经从纯语言类型学转向到对文化的思考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翻译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与安德烈·勒菲维尔（André Lefevere）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中首次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开启了“文化转向”。无论是翻译活动被认为是一种语言实践还是跨学科文化实践，我们在理论研究中总是绕不开语言和文化，这是由其学科属性决定的，翻译理论更是如此。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根深于中国文化，源于中国翻译实践，想要“走出去”得从学科属性出发，突破语言和文化关口，以期在对外交往和话语体系中，实现交流畅通。张柏然（2002）^[11]认为“翻译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这既是事实性的（实然），也是表达性的（应然）。”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既要考虑

到理论的实然也需考虑其应然性。

3.3 西方学术话语中心主义壁垒

全球化进程中，全球话语权的竞争态势随着世界各国力量的对比变化而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都以西方话语为中心，学术话语亦是如此。西方一贯鼓吹“西方优越论”，维护其全球话语中心地位，其本质是不愿意改变当下的话语体系，继续维系其话语霸权地位。我国学术话语对外传播过程，难免会受到阻挠。据统计，在全球3100多本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中，英文期刊数量占比达70%以上，世界两大学术领域重要期刊文摘索引数据库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都来自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国际学术评价体系仍旧以西方马首是瞻，“长期以来，欧美翻译理论占据话语主导地位”（刘泽权、朱利利，2019）^[12]。中国本土理论“走出去”势必在西方话语中心主义的体系中，举步维艰，阻滞中国原创理论。

4 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策略

4.1 提高自身英文书写能力，加强理论改写

全球70%的论文都要英文撰写，用英文撰写学术论文和专著，是与国外同行交流最实际、便捷、有效的途径，只有通过翻译之后，才有可能为国际同行所熟知。学者提高自身的英语书写能力，才能清楚论述学术概念，准确表达翻译理论思想，而不至于处于“说了穿不开的境地”（方梦之，2016）^[13]。或者也可以通过合作，来通过一些国外学者的合作，精准的以英语的方式将自己的翻译理论文稿传播出去，也有助于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比如，张佩瑶“推手理论”国外推介的成功，和其英语书写能力高有很大的关系。此外，理论应用语境发生变化时，加强对自身翻译理论的改写，实现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互动，也能加大国际传播力度，让更多的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理论改写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北美翻译研讨班（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的理论由于Gentzler在*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一书中专门列出一章讨论该流派的理论，该理论才得以广为人知。霍姆斯（Holmes）的翻译学思想，也是被收录到《*Translated*》一书中，经过改写之后，才被人（重新）发现（Toury, 2012）^[14]。可以说翻译直接决定着翻译理论的跨语言传播，图里谈到自己的一部著作里的翻译思想用希伯来语书写，国际翻译学界没法阅读这本书，引起了理解上的对自己翻译思想的误解。图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理论文本语言对于思想传播有多重要，此刻翻

译策略则显现的重要性，

4.2 追求翻译理论本质，加强学理的“普适性”

中国本土翻译理论，最终的归宿还是以解决翻译实践为主，超出了这个实践本质，那么存在的意义就值得我们商榷，理论中存在过于模糊和抽象的术语概念，势必会影响到受众的接受，以及在在指导翻译的过程和操作过程中，难免难以找到抓手，造成翻译理论与方法论脱节。若在形而上研究上只关注理论架构，而持续缺乏实证和具象的翻译实践，那么将空有其表。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要真正的思考其“普适性”科学实用价值，不仅只是解决国内的翻译实践问题，更要对解决人类发展共同问题的有益借鉴和参考，充分展现中国实践背后的知识、思想和价值观。可供实践的翻译范式才是我们翻译理论的最终归宿。加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学理的普遍性、学科的整合性、视野的全景性、范式的多元性、认知的复合性、评价的多向性以及视界的融会性等方面渐进嬗变的发展趋势(许钧, 2012)^[15]。这样的理论才会越走越远，成为经典。这样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才可行。

4.3 提升多模态传播手段，助力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

“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与社交媒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传统模式推介手段也不应该被忽视，比如：书评。书评的对象是“书”，它也是真实地反映书籍内容和形式，梳理书籍的思想性，知识性，是嫁接作者和读者甚至是出版社的一座桥梁，能起到达到“沟通信息”“交流成果”的功效。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有关我国本土翻译理论著作的书评，这势必一方面引起国外同行的关注，同时也把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书籍间接的推介给国际同行，成为他们了解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动向的一个很重要窗口。比如 St. Jerome 出版社的“Translat-ion Theories Explained”丛书，都会对翻译理论的传播产生影响，对各种翻译理论作出客观的描述和判断，从而影响读者对具体翻译理论的看法，做出适合与他们的理论选择，有益于理论的传播。信息化形态下的多模态传播也会影响到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对外传播。多种形式的新型社交媒体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学术交流和推广。国内常用的公众知识分享和创作的平台多见于社交媒体，比如说：微信，抖音，小红书，B 站等等。清楚国外国外学术传播平台和传播方式也有助于理论的推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鼓励研究者使用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并建立自己的账号，鼓励

科学家利用社交媒体与媒体、与公众交流科学知识，展开互动，吸引更多受众的方法。

4.4 探索多维度中西学术对话方式，提高学术话语权

通常，由于人们由于所处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的不同，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导致的对事物或现象的认知存在偏差和分歧，要降低或消除这些认知偏差和分歧，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推动文化交流和思想观念交流，使人们能够在跨文化传播情境下互相理解，克服认知屏障，实现文化共通性，增进彼此理解。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的目的是达成东西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间的互动，彼此产生相互作用和影响。布迪厄指出，“各种场域之间相互关联”(Bourdieu)^[16]，场域中都有自己独特的规则，场域相对独立，权力场域占据支配地位。这种独立性体现为当外界因素施加影响于某个场域的时候，这些影响得“通过场域本身的规则转换之后才能体现”(ibid.: 164)。比如说，如果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希望进入世界翻译学术场域，就必须遵守翻译学术场域里的规则和要求，通过某种合情合理的方式来获得他者的认同，通过发表期刊论文，参与翻译理论创作、参加翻译理论学术会议、出版作品等等这些学术贡献价值的方式都可以实现。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重在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彰显我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达成学术成果交流互鉴，在国际学术格局中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学术中的中国理论和其背后的哲学文化思想。

5 结语

积极推进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让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进世界译学舞台，即是我们向世界传播中国理论思想的一种自觉，也是增强中国学术话语权，促进世界译学声音对话。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走出去”有利于“中国知识”的世界表达与阐释，向世界展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智慧”，加强中国价值观念、中国文化的推广，实现人文浸润，消弭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国际“失语症”，不断增强本土翻译理论的感召力。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 [1] 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中国比较文学,2014(01):6-15.
- [2] 李伟容.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部路径研究——兼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J].中国文化研究,2015(03):29-46.

- [3] 刘泽权、孙媛. 中国翻译理论“失语症”的程度、症候及疗法 [J]. 外语教学, 2023, 44 (02): 86-92.
- [4] 韩子满、钱虹.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国际传播: 现状与展望 [J]. 中国翻译, 2021(6): 103-110.
- [5] 刘宓庆、方华文. 中西翻译文化对谈录 [J]. 兰州大学学报. 2006 (05): 118-124.
- [6]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Discourse [A]. In Young, Robert (ed.).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C]. Boston,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1: 48-78.
- [7] 胡宗山. 中国国际话语权刍议: 现实挑战与能力提升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4(5): 127-135.
- [8] Robinson, Douglas. Hu Gengshen and the Eco-Translatology of Early Chinese Thought [J]. *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 2013, 21(1): 9-29.
- [9] 韩子满、钱虹.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国际传播: 现状与展望. 中国翻译, 2021, 42 (06): 103-110, 192
- [10]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文汇报, 2016-05-18.
- [11] 张柏然. 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 中国翻译, 2002 (01): 57-58.
- [12] 刘泽权、朱利利. 张佩瑶中国翻译话语的体系构建与成果. 中国翻译, 2019, 40 (05): 103-111, 190.
- [13] 方梦之. 当今世界翻译研究的格局——兼论 21 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的崛起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6(3): 55-63.
- [14]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Revised Edition)*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 [15] 许钧. 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 中国翻译. 2012, 33 (01): 5-12, 122.
- [16] Bourdieu, P.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